

版說明



學苑出版社

新中國史學五十年

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係一九四五年在延安草成。因本人才力薄弱，又因當時史料匆促，缺點良多。一九四七年秋華北新華書店翻印本書時，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諸同志曾略有增刪。自解放以迄年之內，未仔細撲研，其完備，但限於工作能如願，研究室諸同志商定先就手頭現有材料，作一次微小的修改。深望讀者今後多給予理解和指正，期能逐步改善，完成一部較為滿意的中國近代史。

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樊孟源、劉桂五、王南、牟安世、錢宏、賈岩、唐彪、王可風、彭開助增刪校訂；許多讀者也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意。

范文瀾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张剑平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张剑平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ISBN 7-80060-169-2

I. 新… II. 张… III. 史学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036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永清印刷厂

开本印张：890×1240 32 开本 16 印张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1501—3000 册

定 价：30.00 元

序

陈其泰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总特点,大概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丰富,成就巨大,而又思潮起伏,道路曲折。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又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叶至 1949 年以前,在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学术成果和精良方法的基础上,适逢中西史学交流的时代机遇,由于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和审查史料、考订史实和叙述历史的方法,加上大批新史料发现的刺激,因而形成并发展了新历史考证学,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学术名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从 20 世纪起,又有唯物史观传入,由此促使这一先进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同样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著名学者,他们创榛辟莽,奋力开拓,在客观地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解决历史研究的实际具体问题和科学地揭示历史复杂现象的实质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撰成了一批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著作。因此,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双流并进,多层风彩的景象,当然,新历史考证学能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存在着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关系。

对于上述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坛的基本趋势和特点,经

过前些年的“世纪回眸”、讨论反思后，学术界的认识是较为一致的。而对于 1949 年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基本估价，则已有的认识相距颇远。这可能与下述两种情况关系甚大：其一，新中国五十年史学距离今天较近，有的时候，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人们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沉静思索、从容检讨的过程，才能观察得清楚，因此目前对它尚不宜作出完全符合客观的评价；其二，评论者看问题的重点不同，由此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关于新中国五十年史学评价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其中尤为关键的问题是：十七年史学是否都成为“政治的附庸”？十七年史学是否都是教条盛行、左倾错误肆虐的年代？在此十七年中历史学家们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精神遗产？十七年史学的成就应作如何估价？

十七年中曾经出现过教条化、公式化错误的盛行，主要是在 1958 年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高等学校中“拔白旗，插红旗”，一些有学问的教授、专家受到批判，学生上讲台，学生编讲义，二三个月功夫即“编”出一本通史讲义，这只能是剪刀加浆糊，用若干条干巴巴的材料对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作图解，贴标签式地引用马恩的词句。只讲阶级斗争，对农民起义尽量拔高，而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概骂倒，制度和史家少有涉及，要把帝王将相和历代皇朝名号一律抹掉，一部历史变成概念的演绎。教条化、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一度势头很猛，使人分不清方向。正像在政治上教条化和左倾错误对国家造成了惨剧的危害一样，在学术上，教条化同

样对史学研究造成惨剧的危害,必须痛加批判、深刻剖析、肃清其流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正是将这项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痛定思痛,花了很多大力气进行拨乱反正,大量地、深刻地揭露教条化错误在史学领域中的种种恶劣表现,全面地进行清算。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出现的新局面、新成绩,就是在清算“左”的错误以后取得的。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经过正、反面教训和这场正义的批判,痛切地认识到:教条主义是革命工作的大敌,也是史学研究的大敌。史学要繁荣进步,必须坚决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彻底铲除其恶劣影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学术研究的指导。

严肃批判并纠正教条主义错误,这是绝对正确和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既要认清教条主义造成的严重失误和曲折,又要对十七年史学的历程和得失,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全面科学的总结和批判。此其中,对于以下一些重要问题,通过广泛搜集史料和深入分析,然后作出恰当的回答,将是很有意义的:在1958年和此后一段时间盛行教条化之前,史学界有无出现彼此平等讨论、为追求真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健康学术空气?至1959年春天郭沫若、翦伯赞相继发表重新评价曹操的文章,引起全国范围内长时间的热烈争鸣;另外,所谓“五朵金花”的讨论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几乎涉及了整个史学界,讨论的范围包括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历史问题,对于这些讨论所反映的学术民主性质和它们对推进学术研究的意义,又应如何评价?十七年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老

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一至四册)发行达百万册,范老以一人之力,对于自远古至隋唐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大量问题作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述,还有其他史学家在这段时间写成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至今仍有其价值,对此应如何评价?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近代史、世界史、民族史、史学史等领域,至此得到了大力开拓;历史学范围内的完整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搜集、校订、标点、编印近代史资料、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等方面,都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并且生动地表现出众多学者在新的时代所具有的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对于这些又应如何评价?

我在这篇短序中,对于所列举的这些自然无法详论。但是,有一点我是必须论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所作的努力。当错误倾向的潮流袭来的时候,正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成熟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勇于挺身而出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范文澜一向态度坚决地反对以教条化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都曾有过重要言论。特别是在1961年,当教条化、公式化倾向盛行的时候,他更是挺身而出,一年之中一连三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予以严肃的批判,揭露其危害。196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5月,

北京举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再次针对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问题,强调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又同吴玉章一同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意义。翦伯赞也在 1959 年、1961 年、1962 年连续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并指出:“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他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就是反对教条化、反对左倾思潮的檄文,他捍卫历史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确实表现出反潮流的大无畏勇气,后来即因此惨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表明他们才真正掌握唯物史观的精髓,真正懂得把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历史实际中去乃是史学工作的灵魂,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

因此,我们决不能缺乏分析地、错误地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来概括十七年的历史研究,更不能误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占了主导地位,就必然要造成教条化的错误。应当如实地评价和肯定十七年中,史学工作在继承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

唯物史观指导下把中国史学继续向前推进的巨大成就；同时，应当严肃地声讨教条化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并分析导致教条化盛行的原因（一类是因研究者水平不高，经验不足造成；一类是政治上左的路线错误的影响、干扰和其后“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疯狂破坏），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来回顾建国后十余年的史学道路，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以唯物史观根本原理为指导，认真地分析中国的问题；一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套用现成公式，不愿作艰苦的搜集、分析史料的工作。前者导致成功，必须坚持和发扬，后者导致谬误，必须痛加批判和摒弃，结论自明。近年来，唯物史观受到严重的责难和挑战。原因很复杂，需要经过深入讨论和不断实践，来予以澄清和作出理论上较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想，其中两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第一，要认真区分以往历史研究成果与失误之轻重大小，尤其是要深入分析造成失误的原因，不能一讲到以往的失误，就归结到唯物史观的账上。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结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结构等等，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学说，总结出人类社会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项，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马恩指出的“规律”，不应理解为就如同自然科学的“定律”一样，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都要重复地出现的东西。毋宁说，是以它概括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指导我们以其原理去从生动丰富的历史进程中去创造性地发掘和总结。新世纪的史学，必定前景更加广阔，风格更加多样，方法更有不断创新。然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体系，它能在吸收许多有益的学说、原理之中丰富

自己,在实践中发展自己。新世纪中最有前途的史学,能真正拿出来与外国同行平等对话的史学,必定是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善于发扬前人学术遗产,并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外国有用东西以丰富自己,在此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的史学流派和著作。

张剑平同志完成的博士论文《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曲折和当前开拓进取的态势为中心,以“上编: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曲折道路”、“中编: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命运的抗争”、“下编: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进取态势”,约30余万字的篇幅,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新中国50年史学演进的历程。课题研究有很大的难度,作者面对的是浩繁的著作、论文和史料,问题不但复杂纷繁,而且相当敏感,如何归纳、分析、总结、评价,对于研究者的驾驭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是很严峻的考验。而他在三年学习期间真正做到发奋用功,迎难而进,全力以赴,心无旁骛,这不仅就勇于从事此一课题的研究来讲非常难得,而联系到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浮躁风气来讲更为可贵。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着手从以下三项给予充分的肯定:(一)论文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著作多、问题复杂,工作量大,作者认真地搜集、爬梳,为此付出了很辛勤的劳动。(二)论文的核心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总结其经验和曲折,论述唯物史观指导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作者是处在唯物史观一再受到责难和挑战的背景下从事此项研究,表现了理论的勇气,甚为难得。(三)作者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评价大量学术问题,分析深入,评价

公允,论文的基本观点和对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说服力。对于新中国五十年史学的全面论述,本论文是第一次,因此在本学科中具有学术前沿的价值。

专家们的这些意见,对于剑平是很宝贵的鼓励。当然,论文所涉及到的问题、著作广泛而纷繁,作者在短短的三年研究中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毕竟是有限的,文中的某些提法,以及对一些代表性论著的举例,肯定有不尽恰当之处。对于存在的问题,剑平应当虚心听取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求得进步,使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3年国庆节前夕,写于北师大寓居

内容提要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著述,旨在通过对 50 余年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研究,对新中国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藉以推进对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为写好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力图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的背景之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十余年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和辉煌的成就,动态地、较为全面地展现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以及未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本着据事直书的原则,对涉及的人和事力图做出较为客观的评述,与已往注重史学思潮和专题研究不同的是,本书的论述建立在史学家和史学著述的基础之上,注重对有影响的史学家的言行及其著述的评述。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的史学,着重对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曲折变化的论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历程,以及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推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健康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史学,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灭顶之灾,以及后期出现的“影射史学”为主线,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横遭践踏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抗争,在深入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获得了新

生。新时期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进展,本书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为主线,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出了过去的误区,以开阔的世界眼光,跟随时代的步伐,进一步吸收世界先进史学思潮和方法,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多方面推进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

在充分展示成绩的同时,作者对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偏向,如否定和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明显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结合史学界对这些错误倾向的纠正,予以客观的评述。关于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成就,本书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为代表,展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另外,又以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这两部有重大影响著述,力图显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以及历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情况。最后,对五十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结合其他史学家的论述,阐发了作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未来的命运,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的看法。

目 录

序(陈其泰)

内容提要

绪论	(1)
一、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	(1)
二、研究历史和现状概述	(7)
三、主要研究成果分析	(11)
四、本书的撰述旨趣	(19)

上编: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曲折道路

第一章 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史学	(29)
一、史学发展纲领的制定和领导机构的建立	(29)
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史学的发展	(37)
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及其影响	(46)
四、重大问题的争鸣及其意义	(5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曲折	(68)
一、史学界“反右”斗争的开展及其危害	(68)

二、“史学革命”及其危害	(76)
三、对尚钺“修正主义”的批判	(90)
第三章 在反思中逐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01)
一、史学界的反教条主义	(102)
二、以曹操评价推动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109)
三、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115)
四、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争论述评	(125)
(一)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观点争论的焦点	(126)
(二)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讨论向政治批判的发展	(137)
第四章 十七年历史学新成就举要	(144)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朽名著	(144)
(一)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	(145)
(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创新	(153)
(三)《中国史纲要》的编撰及其意义	(162)
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	(170)
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	(176)
四、文科历史教材的编撰	(183)

中编：“文革”时期史学发展的严重曲折

第五章 围绕《海瑞罢官》的激烈交锋	(193)
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3)
二、围绕姚文元文章的争论	(198)

三、史学家的风骨和吴晗的自白	(206)
第六章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面迫害	(218)
一、对翦伯赞的粗暴批判	(218)
二、批判吴晗范围的扩大	(224)
三、“文革”时期对史学家的全面冲击	(233)
第七章 影射史学的“理论”及其著作透析	(241)
一、影射史学的“理论”	(241)
二、“影射史学”代表作探析	(249)
第八章 走向新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259)
一、对“影射史学”的反思	(259)
二、给吴晗、翦伯赞以公正的评价	(270)
三、呼吁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	(279)

下编：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开拓进取态势

第九章 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探索	(293)
一、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93)
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301)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新成就	(311)
第十章 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321)
一、发展史学理论学科的思考	(321)
(一)发展史学理论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322)
(二)有关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以及史学理论 学科体系的探讨	(327)

二、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可贵起步	(331)
三、历史学方法论探讨的新收获	(342)
(一)对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观点认识的深化	(342)
(二)对国外史学研究方法的评述	(351)
(三)史学方法研究的新进展	(359)
第十一章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	(372)
一、对以“三论”解释历史偏向的纠正	(372)
二、对《河殇》非历史主义史观的批评	(387)
三、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偏向的纠正	(394)
第十二章 新时期史学研究成就举要	(409)
一、《中国通史》的集大成之作	(409)
(一)《中国通史》的编撰及其特色	(409)
(二)《中国通史》各卷成就述评	(420)
二、《世界史》的编撰特色	(429)
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创新	(439)
四、《中国社会通史》的贡献	(449)
 结语	(457)
主要参考文献	(466)
后记	(478)
 附录：展现半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画卷	(481)